

论女性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

蒋颖荣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951)

摘要:继承性与民族性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特点。通过解析什么是女性学的学科继承性与民族性,分析坚持女性学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存在的问题及其主要成因,并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体现中国女性学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对策思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女性学;女性研究;继承性;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5-0007-04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为了体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首要特性的继承性与民族性,我们要充分融通和利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3类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我们进一步厘清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提供了新的学科取向与思想原则。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

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文化强国、应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和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要求我们处理好继承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强调历史维度。哲学社会科学在一定的时空境遇中产生,具有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其历史性的延续,对特殊的时代性问题作出回应,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凸显民族维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越是悠久,积淀越厚,其民族性越强;哲学社会科学同

时也是民族文化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自身创新变革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反映,具有超越单个民族的世界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中做到3个坚持: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3类文化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二、继承性与民族性在女性学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经过近30年的发展,肇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女性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已从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最初觉醒,转型为集多学科领域为一体,以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视角关照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学科”^[1]。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特点在女性学中具体体现为:

第一,融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女性学研究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推动国外女性学研究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协同,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构建更加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女性学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妇女故事。

第二,将历史起源、历史相遇、历史习得贯穿在女性学研究的始终,注重文化资源发生、发展、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境遇,不忘本来,在历史的维度上推进中国女性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三,深刻理解民族性内在的主体性、对象性、异质性、渐变性,彰显女性学民族关怀、国家关怀、人类关怀的学科旨趣,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56个民族纳入女性学的研究对象中,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中国女性的立场、智慧和价值。

继承性与民族性,是中国女性学研究的外源性迫力,也是女性学研究的内生性动力,它赋予女性学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研究对象上,促使女性学更加主动地将少数民族女性纳入女性学的研究视野,更加主动地

关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女性,以实现女性学研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互补充和促进,从而完善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构建。

在研究内容上,促使女性学更加自觉地立足女性现实的生活世界,研究关系女性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更加自觉地确立国际视野,探索人类共同体中女性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更加自觉地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注重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研究,实现外来文化资源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又注重对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以实现女性学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促使女性学更加积极而审慎地反思既有的学科研究方法,既要历史地分析看待各种研究方法产生的时代背景、适用的具体场域,又要现实地吸收和借鉴新形势下国内外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继往开来,以实现女性学的方法创新。

三、女性学坚持继承性与民族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纵观我国女性学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一方面欣喜于女性学当下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对现实社会的有力推动,另一方面也忧虑于女性学未来发展的理论自觉、方法自觉、未来指向。女性学在坚持继承性与民族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下。

首先,就从事女性学的研究者而言,部分存在着对继承性与民族性理解的误区,从而导致文化对待的极端化、性别关怀的情绪化。

文化对待的极端化表现为: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推崇和“拿来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理解和拒斥。在看待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问题上,张岱年先生认为,“民族文化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阶段。但在这不同的阶段前后相续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这就是民族主体性。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是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服务的。”^[2]“必须学会别的民族的先进文化的成果,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在文化的各方面能够与别的民族并驾

齐驱。只有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才能受到别的民族的尊重。”^①任何文化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起源、特殊的历史相遇、特殊的历史习得。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深刻了解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历史记忆、社会认同、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才能正确对待各种文化资源,担负起女性学研究者所承载的社会历史使命。

性别关怀的情绪化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女权”倾向,即:出于对男权的否定,将两性对立起来,争取女性在男性之上的权力;出于对两性完全不存在差异的认识,落入将女性归为男性的窠臼;出于对女性的特质与独特体验的过度强调,回到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之中。

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对“民族”概念不清晰而导致女性学研究对象涵盖的不全面,遮蔽了女性学研究的民族性。费孝通先生认为,作为民族的概念,应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在最高的层次上,特指中华民族;在基本层次上,指中国的56个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长时期不同民族在不断的交叉流动和相互交往中,有的被分散了,有的被孤立了,也有的在相互接触中融合了,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当前各民族交杂分布在广大地域上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3]。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相遇”的民族不同、遭遇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处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从而导致民族间地区性差异的存在;二是少数民族女性是中华民族女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对女性的同质性研究取代异质性,一是“对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数量非常少,涉及的具体民族数量十分有限,与全国55个少数民族大家庭的成员相比还是极其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少数民族妇女尚未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②

再次,在研究内容上,女性学研究始终围绕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1980年代女性学始创时期为“妇女问题”,即妇女生存与发展的一切问题,重点关注男女不平等问题;2000年代初期研究女性本质与生存发展规律,注重运用性别视角对各个领域知识的改造,直接或间接关注妇女生存与发展最关切的问题;近10年来,主

要研究女性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相关问题是女性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对而言,鲜见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女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化和濡化的关系的研究,女性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的生存智慧、在自我完善过程中向公共空间拓展的价值取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方向的缺失与不足使得女性学研究的历史继承性日渐式微。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女性学使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彰显女性学研究的独特性;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着重观察分析某种社会现象中社会性别呈现的样态、方式及其原因,以及社会性别对女性及男性生存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改变^[4]。然而,历史维度的缺位、主客二分法的贯穿始终,严重影响了女性学研究的历史继承性和民族性。在女性学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谁在说?为什么说?说什么?怎样说?”这就必然涉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实现作为文化他者的研究者与作为文化持有者的研究对象互主体性、让文化持有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创新研究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所在,此问题的解决也将带我们走出女性学自说自话的困境,实现对女性、对人类共同体的真切关怀。

四、提升女性学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对策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对于在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研究中充分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有着十分重要的引领和启发作用。

首先,从事女性学研究的工作者要担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客观、公正、历史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以对女性的关怀、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怀为己任,创新女性学的理论、方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学学科体系和

学术体系。

其次,在“民族”概念的两个层次上进行女性学研究,把同质性和异质性结合起来,既要对具有普遍性、同质性特征的中华民族女性进行研究,也要对具有特殊性、异质性特征的中华各民族(56个民族)女性进行研究;既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女性进行研究,也要对作为个体的中华各民族单个女性进行研究。

再次,因特殊的历史起源而产生特殊的民族精神和历史记忆,因特殊的历史相遇而产生特殊的情感和社会认同,因特殊的历史习得而产生特殊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这始终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方面。对女性的关怀、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怀必然要求我们拓展和夯实女性学研究的内容,关注女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变迁,并追问变迁背后的动因;关注女性的生活世界,挖掘女性的生活智慧和价值取向;关注女性的文化适应,揭示女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性和外在传承性;关注女性的情感认同和历史记忆,关注传统力量积淀对女性的惯性影响力,探究女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行性路径。

最后,引入民族志方法和口述史方法。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可以解决好主位与客位的关系问题,可以让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女性在特定的时空境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方法既是一种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也是一种对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和历史文本进

行分析与解释基础上的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民族志方法最适合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民族志文本能够更充分和更真实地表达多样性文化的存在样态。口述史方法可以为女性学研究增加历史的维度,赋予每个历史亲历者讲述历史的权利,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共同建构,呈现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的历史,使研究者能够观测和分析女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脉络与细节,实现对女性问题的深描^②。

注释:

- ① 参见张岱年的《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载于《东西方文化研究》,1987年第1期。
- ② 参见胡玉坤:《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载于刘东:《中国学术:第17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参考文献:

- [1] 王金玲,王平.从意识觉醒到社会关照:中国妇女学的发展(1995~2011)[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46-55.
- [2] 张岱年.文化体用简析[A].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六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05-206.
-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7.
- [4] 韩贺南.中国妇女/性别学的“蓄势”与“勃发”[N].中国妇女报,2015-08-18.

On the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of Women's Studies

JIANG Ying-r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951, China)

Abstract: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of women's studies, elaborate on the 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adhering to these features in women's studies,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and finally put forth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isplay of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in women's studies.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women's research; inheritance;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 王 灵)